

唐宋八大家 人品·文品·诗品

赵维平 著

河海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宋八大人品·文品·诗品/赵维平著. —南京:
河海大学出版社, 2006. 12
ISBN 7-5630-2307-0

I. 唐... II. 赵... III. ①唐宋八大家—人物研究
②唐宋八大家—文学研究 IV. ①K825.6 ②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41606 号

书 名/唐宋八大人品·文品·诗品

书 号/ISBN 7-5630-2307-0/I·58

责任编辑/杜文渊

责任校对/杨 丽

封面设计/杭永鸿

出 版/河海大学出版社

地 址/南京市西康路 1 号(邮编:210098)

电 话/(025)83737852(总编室) (025)83722833(发行部)

印 刷/南京玉河印刷厂

开 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8 印张 220 千字

版 次/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5.00 元



目 录

坚持文本研究与人文研究并重(代序)

周桂峰

绪 论

第一章 韩愈

- 第一节 韩愈的人品/7
- 第二节 韩愈的文品/11
- 第三节 韩愈的诗品/24
- 第四节 韩愈散文名作精鉴/32

第二章 柳宗元

- 第一节 柳宗元的人品/44
- 第二节 柳宗元的文品/46
- 第三节 柳宗元的诗品/61
- 第四节 柳宗元散文名作精鉴/68

第三章 欧阳修

- 第一节 欧阳修的人品/76
- 第二节 欧阳修的文品/86
- 第三节 欧阳修的诗品/94
- 第四节 欧阳修散文名作精鉴/100

第四章 王安石

- 第一节 王安石的人品/108
- 第二节 王安石的文品/114



第五章 苏洵

第六章 曾巩

第七章 苏轼

第八章 苏辙

后 记 /248

第三节 王安石的诗品/124

第四节 王安石散文名作精鉴/130

第一节 苏洵的人品/140

第二节 苏洵的文品诗品/142

第三节 苏洵散文名篇精鉴/158

第一节 曾巩的人品/170

第二节 曾巩的文品/173

第三节 曾巩的诗品/178

第四节 曾巩散文名作精鉴/182

第一节 苏轼的人品/196

第二节 苏轼的文品/203

第三节 苏轼的诗品/212

第四节 苏轼散文名作精鉴/218

第一节 苏辙的人品/226

第二节 苏辙的文品/229

第三节 苏辙的诗品/234

第四节 苏辙散文名作精鉴/239



坚持文本研究与人文研究并重 (代序)

文学研究必须首先坚持以文本为本位,以话语性的文学作品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从文学的历史进程来看,过去时态的文学活动,包括作家的创作心态、审美心理等等,本身已经不能再现,也无法还原。作为历史活动的遗留物留存下来,并且为研究者的意识所能直接把握的,仅仅是历史上的文学活动的结果。而在所有的结果中最可信赖、最贴近文学活动的本来面目的,则是现在尚能看到的作家作品集,这是用文学话语构成的历史文本。

古代文学研究重视文本,至少包括四个方面:文学文本的定位、文学文本的定性、文学文本的细读和文学文体的解析。对于唐宋八大家而言,细读精读他们的诗文,从中发现作者的本义甚至微言大义,发明其文学价值,这是第一位的。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必须辅之以作家研究、背景研究,中国传统的“知人论世”和西方的“接受美学”相参照。既要研究此文本与作家的关系,探讨文本作为一个作家的生产产品的独特性,又要研究此文本与时代的关系,探讨文本作为一个时代的生产产品的独特性,还要研究此文本与彼文本的关系,即研究此文本的相关文本,使自己对此文本的文意的把握更准确。对于唐宋八大家而言,研究中唐社会情况和北宋中期社会情况;这是“论世”的功夫;研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的生平,这是“知人”功夫;研究当代学者对



唐宋八大家的人文需求,这是“接受”的功夫。

其次要坚持人文研究为导向。人文精神,指人类的文化精神。《易·贲·彖传》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所谓人文。”其中的“人文”概念是相对“天文”而言。天之文表现为阴阳、刚柔,一雨一霁,一温一凉,交轮代错,此是自然之饰,体现了天之美德;而人之文则是天德的世俗化,体现为礼法仪则等人伦,行其所当行,止其所当止,相互制约、补充和依存,此是人之饰,体现了人之美德。观天之文,即把握自然界寒暑、阴晴、昼夜变化的规律性,以审时度变,节宣政令;观人之文,效法天地自然之道,化性起伪,以成就天下人的美德。这是中国“人文”的本来意义。

人文精神是诸文化要素的复合体,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处世哲学、道德意识、审美情趣、人格理想、价值观念、政治信念、爱国主义等等,都是构成一个民族人文精神系统的重要因素。中国特色的人文精神,强调人在对天道认识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对进退、存亡、死生、荣辱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从而进行取舍和追求,以美化人的生活,实现人的价值,强调所谓“舍诸天运而征乎人文”。

人文精神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挖掘作家作品中的人文精神,阐发其对于当今精神文明建设的借鉴作用,是古代文学研究保持长久生命活力的必然要求。唐宋八大家,无疑是唐、宋两代造诣最深的文学家和人格高尚社会活动家,是当时文学成就和成功人生的代表者,其作品和人生中表现出来的人文精神,即使在今天也光华宜人。

古代文学研究坚持文本与人文并重,以文本研究的深厚功力为人文研究提供坚实基础,以人文研究的创新眼光为文本研究开拓广阔视野,这样就能使古代文学研究既具学术价值,又对当代社

会生活产生积极影响。我的同事赵维平教授的新作《唐宋八大家人品·文品·诗品》,既重视文本解读又重视人文研究,创新了唐宋八大家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此书问世,是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可喜可贺的事。

周桂峰

2006年10月于淮阴师范学院

唐宋八大家人品·文品·诗品





绪 论

一、唐宋八大家的由来和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

“唐宋八大家”是我国唐、宋两代八个著名文学家的合称，他们是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和曾巩。明初朱右最早编《八先生文集》，后唐顺之在《文编》一书中也选录了这八个作家的散文作品。茅坤在唐顺之《文编》的基础上进行重新搜集编选，取名《唐宋八大家文钞》。“唐宋八大家”由此得名。

《唐宋八大家文钞》是一部集中体现唐宋派文学理论，并给学习古文的人提供范例的文章总集。全书 164 卷，计收韩愈文 16 卷、柳宗元文 12 卷、欧阳修文 32 卷附《五代史抄》20 卷、王安石文 16 卷、曾巩文 10 卷、苏洵文 10 卷、苏轼文 28 卷、苏辙文 20 卷。卷首有《总序》、《论例》，各家文章前有小引和本传。

唐宋派是明代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所建立的一个文学流派。明弘治、正德年间，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称雄文坛。他们提倡“文宗秦汉”，主张勿读西京以后书，一时士人纷纷附和，以模拟剽袭秦汉文章为时尚。唐宋派针对这一复古思潮，标榜唐宋散文，提出学习古文应从“唐宋八大家”入门，然后上溯秦汉，以求得古人之神气。他们继承了由韩愈、欧阳修发起的唐宋古文起动传统，重申文道合一，强调文章的载道和事功作用；提倡本色，主张文章应直抒胸臆，推崇质朴简洁的风格；总结了古文的创



作现律,创建“开阖首尾,经纬错综”的文章法度。唐宋派的文学理论在当时引起了很大反响。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说:“嘉靖初,王道思、唐应德倡论,尽洗一时剽拟之习”,“李、何文集,几于遏而不行。”在唐宋派四家中,王慎中有倡导之功,唐顺之在理论上多有建树,归有光侧重于创作实践,而茅坤则是唐宋派的集大成者。

嘉靖 23 年,茅坤被谪判广平,在广平更加发愤为文辞,上采汉代司马迁、司马相如、刘向、班固,下及唐韩愈、柳宗元、宋欧阳修、王安石、曾巩、三苏诸家,悉心揣摩他们文章的旨意,认识到诸家之文“调各不同,而其中律一也”,觉悟到往昔一味刻意模仿司马迁的文章,仅得其毛发而未能得其神理。茅坤的这些意见,均见于《与蔡白石太守论文书》。此书作于嘉靖 25 年,可以看作茅坤转变为唐宋派的标志。茅坤于嘉靖 34 年在大名副使任上遭劾辞归,隐居 40 余年,以授徒讲学为业。为指示子侄及生徒学习古文的具体途径,他特地编选了《唐宋八大家文钞》,后由茅坤侄茅一桂刊刻于杭州,销售于金陵等地。

提倡唐宋八大家的作品和文风,这在明中叶是有深刻的政治背景的。以明代“前七子”、“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派垄断文坛,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在散文创作中抛弃了唐宋以来文学发展的既成传统,走上复古的道路。影响所及,致使一些文人学者在散文创作中一味以模拟秦汉古人为能事,其作品成为毫无灵魂的假古董。作为前后七子的反对派而出现的唐宋派,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人,强调唐宋作家的散文作品是学习和继承秦汉古文优秀传统文化的典范,通过编选和刊印唐宋作家的散文选集,大力推广八大家文风。由于这八位作家的文学观点比较接近,都主张散文,反对骈体,主张实用,反对浮华,他们的散文创作又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因而“唐宋八大家”一经提出,便为后人普遍接受,成为文学史上的专有名词,这是明中叶茅坤等人的一大贡献。

总之,唐宋八大家之称,由茅坤编印《唐宋八大家文钞》而定



鼎；《唐宋八大家文钞》因茅坤转变为唐宋派而生发，因教授子弟之需而成形。

二、唐宋八大家的文学和为人价值

唐代的韩愈、柳宗元生活在安史之乱后、盛唐气象一去不返的社会问题积重难返的中唐社会，他们在政治上积极探讨振兴唐王朝之道，以不同方式参加了社会变革活动；在文学上发起古文运动，解决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都未能扭转的骈俪文风。所以这两个人在唐代是成功人生的代表人物，最优秀的文学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

韩愈的古文，对骈文有摧陷廓清的功效。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说他“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称“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高度评价了韩愈提倡古文，倡导儒家思想的历史性贡献。苏洵《上欧阳内翰书》评价韩愈文章：“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鼉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阐明了韩愈文的风格特点和杰出成就。宋林光明《读韩柳苏黄集》论韩愈诗：“退之诗，大抵才气有余，故能擒能纵，颠倒崛奇，无施不可。放之则如长江大河，澜翻汹涌，滚滚不穷；收之则藏形匿影，乍出乍没，姿态横生，变化百出，可喜可愕也。”赞美韩愈的诗如韩愈的散文，有大力奔放的，有藏形匿影的，变化无穷。

韩愈称柳宗元文：“深雄雅健，似司马子长。”（刘禹锡《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引）“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又称他贬永州时：“居闲，益自刻苦，务记览，为词章，泛滥停蓄，为深博无涯涘，而自肆于山水间。”（《柳子厚墓志铭》）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刻画山水，有杰出成就；寓言小品形象生动，含意深刻；传记文工于塑造人物。柳宗元的诗语言峻洁，情意幽深，苏轼在《书



黄子思诗集后》中评他的诗“发纤浓于简古，奇至味于淡泊”，有骚人之韵。

宋代六家，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期正直有为的知识分子，是当时中国最为才华横溢、勇于作为而又善于作为的文人、才子和官员。在他们当中，欧阳修、王安石官至参知政事；欧阳修、苏轼主持过礼部取士；曾巩、苏轼、王安石为官地方，有能吏循吏之风；欧阳修、苏洵、苏轼和王安石长于史论、政论与哲论，有史学家、政论家和哲学家之称。

欧阳修是宋代六家的领袖，《宋史》本传称：“曾巩、王安石、苏洵、洵子轼、辙，布衣屏处，未为人知，修即游其声誉，为必显于世。”苏轼评价他的一生成就说：“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六一居士集》序）苏洵《上欧阳内翰书》称他的文章风格：“执事之文，纤馀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舒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苏轼是六家最高文学成就的代表者，其散文创作尊重艺术表现规律，融精美形象与精辟哲理、叙述议论抒情于一炉，既给读者以形象感染，又给读者以思想震撼和心灵点拨，“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汨汨，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如是而已。”（苏轼《自评文》）其诗清新精美，自然洒脱，虽有散文化、议论化、才学化倾向但在宋代又最具形象性。欧苏之外，王安石散文政治色彩浓厚，写景小诗清新峻峭；苏洵散文有战国策士风范，表现出一定的政治智慧；曾巩诗文平和委婉，有文人和循吏气质；苏轼诗文才气不及大苏，锐气不及荆公，但得中正之旨。

唐宋八大家在为人处世方面，各有特长，各有短处；各有成功之处，各有人生败笔。韩愈有强烈的功名事业心和舍我其谁的自信自尊，加上其百折不回的坚韧，使他成为唐以后“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苏轼语）的文化名人；但韩愈也有与人相处



过于较真、不够灵活的毛病，得罪过不少人。柳宗元以正人君子情怀，处中唐多事之秋，“峣峣者易缺，皎皎者易污”，“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政治上过早地崭露头角，招来普遍的嫉妒；所依明主过早禅位，使他失去政治依靠。这两方面原因促成柳宗元终生不能在政治上有大作为，只以文学创作和哲学思想称名后世。

宋代六家，生当升平盛世，但人生之路并不平坦。欧阳修德高望重，最得人心；惠眼识才，乐于助人。创造了为政以简而民不怠，为政以宽而事不废的为官风范；能说能做还能写，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取得圆满成功，撰《新唐书》、《新五代史》，立德、立功又立言。但在政治斗争中不耐对手算计，晚年消极颓废，未免虎头蛇尾。王安石性格刚毅，心如铁石；果于任事，操刀必割。但遇事操之过急，做事魄力有余而灵活不足，最后众叛亲离，变法难以为继，“有济世之心而无济世之术”。曾巩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仁政惠民思想，既清廉勤政又有惠民之术，可谓宋代循吏。首先推荐王安石于欧阳修，但也首先发现王安石气量狭小，虽不得王安石提携但也避免王安石迫害，可谓知人善处、明哲保身。但做事魄力不大，自己埋没了自己之才。苏洵大器晚成，27岁始发奋读书，未免蹉跎岁月过多，好在虽后发能一发而不可收拾，不仅自己成为文化名人，而且指导二子成才，所以不失成功人士。苏轼一秉忠君爱民之心，在北宋中期党争中奉行独立不倚人格，但也因此吃尽苦头，又能以平常心对待政治灾难。由于出身寒微，正统观念根深蒂固，所以他在党争中脆而不坚、缺乏韧劲，遇到麻烦总是急流勇退、全身远害，善于自保而难当大任。苏辙天生配角角色，守成有余而进取不足，政治上才具有限、作为不大，文学上略逊于其兄而不亚于王、曾，一生无大灾难也无大作为，与其才具相称。

三、本书特色所在

世纪之交，国内以唐宋八大家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层出不



穷。但绝大多数是唐宋八大家散文作品选注或鉴赏,如方笑一著《唐宋八大家散文选》,侯琪选译《唐宋八大家散文对读》,全彦芳、王增学主编《唐宋八大家名作精品鉴赏》,宋晶如注释《唐宋八大家古文(上、下册)》,韩兆琦等著《唐宋八大家名篇赏析》,刘禹昌、熊礼汇译注《唐宋八大家文章精华》,邬霄鸣编《唐宋八大家文选》。少数成果是作家作品研究,如朱世英、郭景春《唐宋八大家散文技法》分别论述了八位散文大家的散文理论和创作实践;吴小林《唐宋八大家》介绍了“八大家”称呼的由来、唐宋两朝的古文运动、八位散文大家各自的文学贡献。

本书作为唐宋八大家研究学术专著,内容上以八大家的人品、文品和诗品为重点,彰显作家的文学价值与挖掘其为人处世造诣并重,较之他书深度或广度过之;作为师范院校选修课教材而编,选取文学史上最优秀的作家,深入探讨其文学和人生光彩夺目原因所在,体现选修课既加深或拓宽必修课所学,又侧重培养学生人文素质的教材开发要求。

本书所引八大家诗文,以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版《文白对照唐宋八大家文钞》为蓝本。



第一章 韩 愈

在中唐,韩愈是非常重要的文学家。一方面他有大量杰出的诗文作品,另一方面他作为文坛诗坛的领袖,广交文友,提携奖掖,不遗余力,在他周围聚集了不少志趣相投、风格相近的文人。这样,他与这些文人便形成了一个文学集团,在政治和文学两方面都有建树。

第一节 韩愈的人品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郡望昌黎,自称昌黎韩愈;任过吏部侍郎,有韩吏部之称;死后谥“文”,人称韩文公。有《昌黎先生集》。韩愈生活中唐社会,历仕德宗、顺宗、宪宗、穆宗四朝,以文人师友、正直臣子的面目为时人后人敬重。

1. 不幸少年,磨砺成才

韩愈出生在一个下层正直官员之家,他三岁时父亲死去,成了孤儿。“养于从父兄。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学儒,不俟奖励。”(《旧唐书》本传,下同)勤奋好学,加上喜欢与名人切磋,自然萌发大志,“大历、贞元之间,文字多尚古学,效杨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在与当时名儒独孤及、梁肃的交往中,韩愈锐意钻研学问,萌发了做振兴儒学的一代大家的志向。



2. 初入仕途，崭露头角

韩愈为进入仕途，大张旗鼓地以文会友，“投文于公卿间，故相郑余庆颇为之延誉，由是知名于时。”这样，韩愈就比较轻易地中了进士。早年的韩愈先从幕僚做起，做过汴梁守官董晋的“巡官”、徐州主官张建封的“宾佐”，而且他不因官微言轻而掉以轻心，事事处处都举轻若重、严肃对待，很快就做出了成绩，创出了个人风范，“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操行坚正，拙于世务。”由地方幕僚“调授四门博士，转监察御史。”成了朝中官员。入朝为官的韩愈仍然仗义执言，“德宗晚年，政出多门，宰相不专机务。宫市之弊，谏官论之不听。愈尝上章数千言极论之”，但不幸的是，唐德宗不仅不纳忠言，反而“怒贬为连州山阳令”，使韩愈初尝直言苦头。

3. 因言得祸，以文自解

元和初年，韩愈入朝为国子博士，后升任都官员外郎。长安近畿发生了华州刺史阎济美罢停华阴令柳涧县务的事，数月后阎刺史职满离任时，柳涧鼓动百姓遮道索要“前年军顿役直”，后任刺史赵昌追查柳涧替前任出气。韩愈听到这件事，便以“刺史相党”的罪名弹劾阎济美、赵昌。监察御史李宗爽在调查中，却发现柳涧“赃状”，韩愈以所奏不实，又降官国子博士。韩愈好心不得好报，满腹郁闷无法排解，就创作了《进学解》。这篇赋假借国子先生与诸生的对话，写韩愈本人内心的矛盾，他一方面认为“诸生业患不能精，无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只要有德有才，就能兼济天下、施展抱负，另一方面也对自己“跋前踖后，动辄得咎。暂为御史，遂窜南夷；三为博士，冗不见治。命与仇谋，取败几时”的现实遭遇而困惑；一方面庆幸自己“圣主不加诛，宰臣不见斥，此非其幸哉！动而得谤，名亦随之。投闲置散，乃分之宜。”另一方面对“孟轲好辩，孔道以明，辙环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大论是弘，逃谗于楚，废死兰陵”也有兔死狐悲的伤感。此赋文情并茂，“执政览其文而怜之，以其有史才，改比部郎中、史馆修撰。



逾岁，转考功郎中、知制诰，拜中书舍人。”韩愈在长安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

4. 文官从戎，立功还朝

一般人只知道韩愈是文人，领导过中唐古文运动，不知道韩愈还有一段从戎经历。中唐藩镇割据是一大社会问题，当时盘据在淮西的军阀吴元济与中央政府对抗，威胁着唐王朝漕运生命线，给唐王朝造成很大麻烦。宪宗派御史中丞裴度考察淮西前线，裴度回复宪宗淮西可平，但宰相反对用兵。韩愈上书宪宗支持裴度，理由是连年“淮西修器械防守。金帛粮畜，耗于给赏。执兵之卒，四向侵掠，农夫织妇，饷于其后，得不偿费。”他主张快刀斩乱麻，“兵不多不足以取胜，必胜之师，利在速战。”（《论淮西事宜状》）。经过一番争论，主战派占了上风，韩愈得以上战场效命，“元和十二年八月，宰臣裴度为淮西宣慰处置使，兼彰义军节度使，请愈为行军司马，仍赐金紫。淮、蔡平，十二月随度还朝，以功授刑部侍郎，仍诏愈撰《平淮西碑》，其辞多叙裴度事。”（《旧唐书》本传）关于韩愈在平定吴元济之战中所起的作用，新旧唐书语焉不详，但他被裴度任命为行军司马，职在执行赏罚、整肃军纪，当然也少不了草定文书、参谋军机之类的事。因为功不可没，凯旋后韩愈被提拔为二品高官刑部侍郎。这是韩愈政治生涯一个高峰。

5. 遭遇弊政，不能不言

正在韩愈有职有权兼济天下的时候，朝中发生了宪宗皇帝崇佛劳民的事。《旧唐书》本传中载：“凤翔法门寺有护国真身塔，塔内有释迦文佛指骨一节，其书本传法，三十年一开，开则岁丰人泰。十四年正月，上令中使杜英奇押宫人三十人，持香花赴临皋驿迎佛骨。自光顺门入大内，留禁中三日，乃送诸寺。王公士庶，奔走舍施，唯恐在后。百姓有废业破产、烧顶灼臂而求供养者。”韩愈睹此荒唐弊政，毅然上书谏阻，“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难晓，苟见陛下如此，将谓真心信佛。皆云天子大圣，



犹一心敬信；百姓微贱，于佛岂合惜身命。所以灼顶燔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唯恐后时，老幼奔波，弃其生业。若不即加禁遏，更历诸寺，必有断臂脔身以为供养者。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非细事也。”此书激怒了并非明君的宪宗，“愈言我奉佛太过，我犹为容之。至谓东汉奉佛之后，帝王咸致天促，何言之乖刺也？愈为人臣，敢尔狂妄，固不可赦！”“出疏以示宰臣，将加极法”，幸亏裴度、崔群等人说情，最后贬韩愈为潮州刺史。上书谏迎佛骨，是韩愈政治生涯中辉煌浓重的一笔，但也结束了韩愈与宪宗的政治蜜月，使此后的韩愈难于再对朝政有大作为。

6. 为官一方，去害兴利

潮州濒临南海，唐时为荒远之地。“所领州，在广府极东。去广府虽云二千里，然来往动皆逾月。过海口，下恶水，涛泷壮猛，难计期程，飓风鳄鱼，患祸不测。州南近界，涨海连天，毒雾瘴氛，日夕发作。”韩愈到任后“询吏民疾苦”，得知潮州鳄鱼猖狂，祸害人畜无数，韩愈一面“令判官秦济炮一豚一羊，投之湫水，”（《旧唐书》本传）一面自诵所作祭文，警告鳄鱼“傲天子之命吏，不听其言，不徙以避之，与冥顽不灵而为民物害者，皆可杀。刺史则选材技吏民，操强弓毒矢，以与鳄鱼从事，必尽杀乃止，其无悔！”（韩愈《祭鳄鱼文》）史载韩愈此举大有成效，“数日，湫水尽涸，徙于旧湫水西六十里。自是潮人无鳄鱼患。”（《旧唐书》本传）。后由潮州转任袁州刺史，袁州时兴将子女抵押出去，借人钱财，超过还钱期限不能还钱，子女便成为债主的奴隶，韩愈上任后，“设法赎其所没男女，归其父母。仍削其俗法，不许隶人。”（《旧唐书》本传）此举移风易俗，泽及百代。

考察韩愈一生，发起古文运动是其主在成就，“常以为自魏、晋已还，为文者多拘偶对，而经诂之指归，迁、雄之品格，不复振起矣。故愈所为文，务反近体，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后学之士，取为